



TAX HAVENS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

[英国] 罗内·帕兰 [英国] 理查德·墨菲
[法国] 克里斯蒂安·肖瓦尼奥 著 李芳龄◎译



TAX HAVENS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

[英国]罗内·帕兰 [英国]理查德·墨菲 | 著 李芳龄◎译
[法国]克里斯蒂安·肖瓦尼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 / (英) 帕兰 (Palan,R.), (英) 墨菲 (Murphy,R.) ,
(法) 肖瓦尼奥 (Chavagneux,C.) 著; 李芳龄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

书名原文: Tax havens

ISBN 978-7-5447-4528-4

I . ①钱… II . ①帕… ②墨… ③肖… ④李… III . ①税收优惠－研究－世界
IV . ①F8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2955号

书 名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

作 者 [英国] 罗内·帕兰 [英国] 理查德·墨菲 [法国] 克里斯蒂安·肖瓦尼奥

译 者 李芳龄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江 汀

原文出版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34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28-4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二〇〇七年九月，距离史上最惨烈的金融危机之一爆发后仅仅一个月，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 Bank）即濒临倒闭。在此之前，北岩银行快速扩张，其增长的引擎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债权担保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简称 CDOs）以取得资金，并崛起成为英国第五大房贷业者。但是，这些债权担保凭证的发行者并非北岩银行本身，而是它的影子公司——花岗石总发行公司（Granite Master Issuer plc）。这项安排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个影子公司的所有权人并不是北岩银行，而是北岩银行设立的一个英国公益信托，这个原本应该是独立运作的组织，其大部分的营运管理是在欧洲著名的租税天堂^①——泽西岛（Jersey）——进行的。

二〇〇八年三月，美国投资银行业举足轻重的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濒临破产，导致该公司资金大出血的是它旗下的避险基金，其中许多避险基金的注册地是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和都柏林的国际金融中心，两者都是知名的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知名租税天堂纷纷被卷入金融危机纷争，这绝非巧合。若你以为租税天堂是阳光普照、令人联想起伊甸园的异国岛屿，是少数亿万富翁、黑道分子和贪腐独裁者隐藏不法所得之地，那你可就错了。在二〇〇八年至二〇〇九年的金融危机中，租税天堂是经常被谈论的话题，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的垮台引发全球长达一个月的金融恐慌，而该公司的注册地正是美国特拉华州（Delaware），从

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特拉华州就一直是美国境内的租税天堂。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紧接着爆发了马多夫诈欺案——一场由华尔街知名金融家伯纳德·马多夫（Bernard Madoff）一手策划、金额达五百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很快地，马多夫案和租税天堂之间的关联性就曝光了，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出大幅标题：“马多夫聚光灯照向境外资金的角色”。

在本书中，我们并未指称租税天堂是导致二〇〇八年至二〇〇九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我们确实认为，租税天堂是使这场金融危机加速的最主要动力之一，我们也认为，监管租税天堂是未来任何一项稳定金融市场计划中的关键要务。

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我们，G-20 集团已经紧跟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之后，极力对这些租税天堂施压，个中缘由除了稳定金融市场，当然还有其他较传统的理由。由于租税天堂可以让人逃避人生难逃的两件事之一：税。因此它们为大多数国家的财政开了一个大漏洞。此外，租税天堂还被用来规避法规、洗钱、藏私房钱或隐瞒商业活动。

法国人称租税天堂为“paradis fiscaux”（财务乐园或财务天堂），这或许是更贴切的名称，因为除了租税，它们还涉及其他广泛的财务用途。事实上，各种语言对此概念的翻译都稍有不同，这恰好反映了租税天堂角色与功能的微妙差异。西班牙人认为租税天堂是“asilos de impuesto”（租税庇护所），但跟法国人一样，他们也使用了“parasisos fiscales”这个名称。意大利人使用“rifugio fiscale”这个名称，直译就是“财务庇护所”。在德国，租税天堂被译为“steuerhafens”，最接近这个名称的英语含义，但俄罗斯人使用的名称直译为“特别租税区”，意指宽松税制或对资本提供租税诱因。国际组织不使用这类流行名称，它们使用“境外金融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意指租税天堂跟其他

的金融中心并无两样，不过我们将在本书中解释，租税天堂其实不同于一般的金融中心。鼓吹改革者现在称租税天堂为“保密地区”(secrecy jurisdictions)。名称上的差异，足以显示租税天堂复杂的多用途现象。

我们不难找到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沿着摩纳哥的著名港口散步，你很难找到一艘游艇不是悬挂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英国马恩岛 (Isle of Man)、泽西岛或卢森堡等重量级租税天堂的旗帜。由于宽松法规一向是租税天堂的典型特征之一，因此就连卢森堡这个内陆国，也已经变成全球几大船籍国之一。

或者，你不妨查询一下众多网络赌场的地址，看看能不能找到任何一家不是在租税天堂注册的。总的来说，租税天堂的功能显然并非只是避税或逃税，如今它们的商业模式，有一大部分是暗中破坏许多法规，不过低租税政策仍然是它们的一项主要特色。

个别来看，一个租税天堂或许小而无足轻重，但倘若所有租税天堂结合起来，则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它们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跨国企业和富人提供“摆脱法规”的手段，破坏了许多国家的法规与租税措施。其次，这样的做法扭曲了全球化的代价利益分配，使全球的富人与精英群受惠，受害的是绝大多数人口。这样看来，租税天堂在全球化中扮演的核心角色，至少是自一九八〇年代开始的。

然而，租税天堂是法律实体，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是主权国家或地区，这两者皆有制定国内法的合法权，可以选择制定其他国家认为有害的税法与金融法规。在此，“合法”指的是“法律许可”、“法院认可或确立”或是“官方准许”，合法性跟舆论或道德几乎无关。这些地方是在行使它们的法律权利，而它们所持的理由是：国际法允许它们这么做！

我们认为，咎责租税天堂依独立主权所做的法律选择，是过度单纯化。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租税天堂幅员都很小，只有少数地区设

有大学或研究中心来传授必要技能，以支援繁荣的全球商界，也只有很少的租税天堂拥有足以维持高生活水平的当地资源。租税天堂是金融管道，为赚取服务费用，它们使用自己最主要的资产——独立主权，来服务非居住者的会计师、律师、银行及金融业者，这些人使得租税天堂所能提供的特权成为一项需求。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现代管制型国家的成形，一些先进工业国家展开了漫长而艰难的税制改革过程。在一九三〇年代大萧条之前，国家在国民经济中一直扮演次要角色。此后，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从二十世纪初期的平均 10%，一路升高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平均 30% 至 40%。在这些发展的同时，避税与逃税也成为相当引人兴趣的议题，不过，租税天堂仍然只是律师、会计师和税务专家才会感兴趣的专业议题。一九七〇年代的长期停滞性通膨和伴随而来的美国财政危机，使人们再度燃起对租税天堂的兴趣，这一回，租税天堂不再只是被视为助长避税与逃税的角色，而是更进一步被视为新兴的金融中心。尽管如此，有关租税天堂的研究仍然是次要的专业领域，对主流学术几乎不构成影响。从一九九〇年代末开始，情况开始明显改变。首先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一九九八年针对“有害的租税竞争”（harmful tax competition）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报告，接着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便把租税天堂，视为它们的首要研究主题之一。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学者、记者还有公民社会组织把注意力转向租税天堂。于是，有关租税天堂的新信息和理论性争辩暴增。

本书针对租税天堂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与功能，提出最新的评估，并介绍全球各地租税天堂的源起与发展过程，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一直到近期的相关国家、中东和非洲等地区。此外，本书也提供了租税天堂现象的最新规模估计，解释了租税天堂的各种用途，并分析了租税天堂对国家与商业造成的影响。最后，我们分析了 OECD 和欧盟

打击境外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并思考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形。虽然近年来有关租税天堂的文献激增，但就我们所知，本书是第一本综括各类研究与知识的著作。

我们的主要论点是：世人对租税天堂的认知，大多不正确。租税天堂并不是在世界经济的边缘运作，而是现代商业实务中的一部分。此外，租税天堂的角色并不是要和国家对立，而是要和国家配合。事实上，我们应认识到租税天堂不仅是避税和逃税的管道，更是广大金融界中的一部分，也是组织、国家或个人资金管理运作的一环。租税天堂已经成为当代全球化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机制之一，也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其中一项主因。它们的独立主权使它们自成一格，但也正是它们的独立主权，使它们得以用自己能够主导（至少是部分主导）的方式，来融入整个世界。

金钱、财富、租税天堂

不论是东亚、俄罗斯、阿根廷等地的金融危机，还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意大利食品业巨擘帕玛拉特公司（Parmalat）、瑞富金融集团（Refco）、安然公司（Enron）等企业的弊案，乃至于二〇〇八年至二〇〇九年间金融危机中的北岩银行、贝尔斯登和马多夫“庞氏骗局”，在过去二十年，每当爆发金融危机或丑闻时，总是会出现境外地区的名字。

二〇〇八年二月曝光的一则消息，堪称这类弊案的高潮：有一只名叫“君特”（Günter）的狗，跟着他一千四百名德国同胞的脚步（其中绝大多数是人类），开设由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的列支敦士登银行（LGT Bank）管理的匿名信托账户，借此逃避德国的税赋。二〇〇八年六月，瑞银集团（UBS）的一名员工在法庭认罪，坦白

他协助一名俄罗斯富豪在美国逃税数百万美元。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瑞银在瑞士的一名资深员工因协助美国人逃税遭起诉，该名员工估计，瑞银协助隐匿的资产达两百亿美元，而瑞银每年从中收取的服务费用可能高达两亿美元。据报道，瑞银目前对美国当局的调查工作采取合作态度。该名员工表示，瑞银在为美国客户管理境外账户时，选择不顾美国的相关法规，并在操作过程中协助客户逃税。

很显然，租税天堂以及其所协助的逃税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有时候，量的增长甚至高到导致质的变化，和租税天堂有关联的可观数字显示，它们在当代世界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但却往往被轻视。我们希望，如果任何人仍然认为租税天堂只不过是余兴节目、是富人与名人才玩得起的活动，那么在阅读本书后，他能够改变这样的想法。

相关的统计数字绝对令人咋舌，我们估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四十六到六十个活跃的租税天堂〔参见本书第一章（表 1-4）〕，约有两百万家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y，简称 IBC，泛指种种令人混淆的公司法人，其中大多数极其不透明）在这些租税天堂注册，还有无数的信托、共同基金、避险基金和专属保险公司^②在这些地方设籍。大约有 50% 的国际银行放款业务，以及全球 30% 外国人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FDI）的股票，都在这些地区注册。一些非常小的岛屿，跻身全球最大金融中心之列，例如开曼群岛，它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国海外领土，是全球第五大国际金融中心。榜上有名的还有泽西岛、格恩西岛（Guernsey）、马恩岛等面积狭小的英国皇家属地，以及我们称之为“中介租税天堂”（intermediate haven）的瑞士、卢森堡、爱尔兰和新加坡等国。

《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罗伯·法兰克（Robert Frank）创造了

“Richistanis”（富豪国人）一词，用来称呼全球的富人。拿二〇〇七年来说，这些富豪国人把大约十二万亿美元的财富放在租税天堂，犹如把美国一整年的国民生产毛额全都寄放在租税天堂。

避险基金业已发现了租税天堂这块乐土，据估计，全球的避险基金业者有 52% 设籍于加勒比海的四大租税天堂——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巴哈马。不过，这些数字很混乱，例如，开曼金融管理局宣称，全球避险基金业者光是在其领土注册的就有 35%，有些文献举出的数字甚至高达令人存疑的 80%。这些未解的争议显露出一个令人困窘的事实：我们对于避险基金业的了解实在太有限了。

统计数字着实惊人，但它们只不过是数字，数字需要解读与诠释，这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从政治经济学家的角度来加以诠释，旨在解读这些数字隐含的政治与社会趋势。我们认为，这些数字代表现代世界中存在一种极为吊诡的现象，而这些数字所代表的现象，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逃避。更确切地来说，这些数字抽象地表现出，政府、企业和全世界的商业精英在集体逃避他们共同规划出的法规。

这些精英主要寻求的是避税，希望能避开或减轻他们在国家提供的“集体财”（*collective goods*）中应该分担的支出，所谓集体财包括安全、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卫生、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并且，精英也寻求规避法规，而他们想要避开的，多半是国家为了维持秩序与稳定而实施的金融和商业法规，讽刺的是，若没有这些法规，富人根本无法变得这么有钱。此外，租税天堂也让人得以应付其他许多较为隐晦的社会管制，例如规避赌博及色情的相关法令。

当然，并非所有税赋及法规都有其必要性，或是对社会有益。

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严格管制其境内的广播业，只有公营广播公司才能合法经营。如今回顾起来，境外电台（offshore radio）的出现显然是一项有益的发展，例如卢森堡电台（Luxembourg Radio）和卡罗琳电台（Radio Caroline），这两者的经营都是本着租税天堂的原理。后来，当政府终于认识到这些境外电台有多么受欢迎，以及试图控制无线广播有多么徒劳无功之后，便松绑了对广播业的相关法规。在这个例子中，“境外”成为一股现代化的力量，致使政府扬弃有碍发展的法规。不过，广播业是一个特例，人人都能很容易地收听到广播。在大多数案例中（实际上是本书讨论的所有案例中），租税天堂提供的各种益处的进入门槛都相当高，因此，它们的客户仅限于少数极富有者。结果很不幸地，受惠于租税天堂的是有钱有势的人，而代价绝大部分却由社会上其他人来承担。

我们在前面提到，租税天堂在全球化中扮演核心角色，意思是指：全球化的利益与代价将如何分配给全世界人民，取决于许多结构性因素，而租税天堂是其中最重大的一项。租税天堂只施惠于世界上少数有钱有势的人，让他们享有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含义的问题。

当然，从最贫穷到最富有的社会阶层之中，每个社会阶层都会有人占集体财的便宜，以获取私利。租税天堂现象就是最有钱有势者有计划地大规模占集体财的便宜，规模之大非常罕见，而且这种现象发生在全球各地，这可能是前所未见的情形。因此，我们说租税天堂是特定类型全球化的核心，而这种全球化有一项特征：富者和其他人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这样的全球化既非必要，也非不可避免，这是许多因素下的产物，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国际政治对租税天堂的温和、宽容态度，尤其是和美国相关的国际政治。

监管对策

统计的种种惊人数字告诉我们，租税天堂是扭曲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角色。其一，它们不仅破坏国际金融监管环境，也破坏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的租税政策，并波及未参与全球化的地区。其二，它们共同成为扭曲全球化利益与代价分配的工具。大大小小的现代企业和租税天堂的牵连程度虽然惊人，却鲜为人知，如今，和租税天堂没有关联性的国际企业或事业，已堪称稀有物种了。统计数字显示，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全世界各地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过，世人大多不会直接感受到这个由租税天堂造成的冲击，直到最近，租税天堂暗中破坏金融法规的角色才暴露出来。

但是，这一切早就不是新闻了，那些工业大国又为何会容许这些地区崛起和茁壮呢？其实，它们也不是完全被容许。美、英、法、德等国不时会修改某些法律漏洞，对某个租税天堂施压，要其改变法规与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也做出一些无效的尝试，试图发展出一致的国际行动来反制租税天堂。但坦白说，这些行动并未能获得多少成果。更糟的是，这些国家（德国和法国也许除外）正是二战后租税天堂现象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基于种种理由（将在后文讨论），观点与氛围开始有了改变。首先是 OECD 采取“有害的租税竞争”行动，继而出现一些行动方案，开始产生了一些反制动力。但是，诚如澳大利亚学者杰森·夏尔曼（Jason Sharman）在二〇〇六年的著作《暴风雨中的避风港》（*Havens in a Storm*）中精辟详尽的分析，这些努力大体而言是徒劳无功的。然而三年之后，租税天堂看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

对租税天堂的忧虑，其实已经沸腾多时，不过租税天堂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在历经很长一段时期后才全面浮现，首先顿悟的大概是欧盟领袖。虽然 OECD 的行动软弱无力，但欧盟已经奋起而领导全球对抗租税天堂，尽管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当选总统，反击租税天堂行动的领导令牌仍然不太可能传给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当然知道租税天堂的问题，克林顿政府甚至是多边合作对抗租税天堂的推动力之一，但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不再支持打击有害租税竞争的多边合作。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处于全然不同的困境，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奥巴马就在各项打击租税天堂的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接掌总统大权后，他发出了重要的政策改变讯息，和法国及德国联手对抗租税天堂。

在对抗租税天堂的监管对策（regulatory response）的演进历程中，二〇〇七年至二〇〇九年的金融危机或许会是个重要的分水岭，我们将在本书的结论中，探讨对抗租税天堂的监管对策，与近期的发展情形。

什么是租税天堂？

要定义租税天堂不容易，因此我们将用一整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主题。在这里，容我们简单地这么说：租税天堂是有充分自主权，可以制定租税、金融等法规的地区或国家（并非所有租税天堂都是主权独立国家）。它们利用自主权订立法规，旨在协助非居住者的个人或企业，逃避非居住者在经济交易进行地应遵守的法规义务。

大多数租税天堂的另一项共同特征是，提供保密的环境，让人可以几乎完全匿名地使用根据当地法所设立的公司或账户等。租税

天堂的第三项共同特征是，一旦在这些地方注册设立实体后，其使用相当方便且便宜。

逃税与避税

顾名思义，租税天堂被用来避税与逃税，不过，这两个词常被混淆，有必要先在这里做一些厘清。几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个人及公司，都有机会在居住地或营运地的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所谓的“税务规划”(tax planning)。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包括先进工业国家中薪资尚可的大多数人）而言，“税务规划”的概念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通常从所得的源头就被扣税，税赋的计算大抵就是实行这种方式。但是对世界上少数的富人和多数公司而言，“税务规划”是事业及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有一个特别名词用以形容当中某些人的生活经验：称他们为“永久旅人”(permanent tourists，简称 PT)，或是为了税赋目的而“恒常不在”(permanently not there)的人。不过，这是极端的情形，在实务上，税务专家把租税策略区分为三种。

第一种为遵守税法(tax compliance)，亦即公司或个人遵守他们所在国家的所有税法，在报税时充分提供一切相关信息，并且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依法缴纳正确税款，所谓“正确”指的是，他们进行交易的经济实质(economic substance)跟他们在报税表格上填写的内容相符。

和遵守税法相对的则是逃税(tax evasion)。逃税是意图减轻个人或公司税款的非法活动，当纳税人未申报其全部所得，或是申报不实费用或不可抵税支出，借此降低应税所得时，就是逃税行为。在大多数国家，逃税是刑事犯罪，但在少数国家（例如瑞士和列支

敦士登），逃税是民事犯罪，两者差别甚大。这些国家无法在民事案件上提供司法互助，因此当其他国家要求瑞士当局协助调查跟逃税有关的案件时，瑞士当局最常见的反应是，好像热切地想要杜绝这种不名誉的做法，但不幸的是，他们不能提供司法互助，因为根据瑞士联邦法律，逃税是民事案件。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凸显了这种典型的响应。二〇〇八年，大批外国人通过高度隐秘的列支敦士登基金会逃税的情况被曝光，该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震惊且失望地发现，这些秘密的基金会（根据一九二六年通过的法律所设立），竟会被外国人滥用来逃税。这位发言人表示，列支敦士登或许有点过于天真，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像该国人民一样，乐意诚实地缴交所有的税，但天真并非罪过。这些话隐含的意思很明显：列支敦士登希望我们相信，该国被恶劣卑鄙的外国人欺骗了。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列支敦士登的这番回应。

第三种租税策略是避税（tax avoidance）。避税是介于遵守税法和逃税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大量会计师、律师、银行家和税务专家最爱的区块。严格地说，避税的个人或公司，企图不外乎以下三种：第一，他们可能希望能缴低于某国法律合理解释下所要求的税额；第二，他们的所得实际上是在甲国赚取的，但他们希望在乙国报税；第三，他们可能想要设法延后缴税。

就法律上而言，逃税和避税明显有别，税务专家喜欢引用许多判例——主要是看上去支持避税合法性的大国的判例。不过，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首先，几乎所有国家的税法都很复杂，许多避税靠的是税法疑义。其次，世界上并没有一套全球通用的税法，在跨国交易时，往往很难避免钻两国税法差异漏洞的情形，税务专家称之为租税套利（tax arbitrage）。结果，往往难以根据通用的标准，

来判定逃税与避税的界线，而大多数参与租税天堂实务运作的人，更是没有能力去了解这些差别，而这是税务专家可以轻易利用的状况。因此在本书中，我们谈论避税与逃税时，并未明显加以区分。我们这么做，依据的是前英国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Dennis Healey）说过的一句名言，形容两者的差别是“一面监狱围墙之隔”。

大英帝国复辟

金融被视为非个人单位进行风险交易的网络，这个网络高度宽松、分权化且全球化，而其中伦敦通常被列为全球规模最大或次大的批发金融中心。我们认为，实际上，不论从国际银行授信业务、外汇还是从店头市场衍生性商品交易、海上保险费或国际债券发行来看，伦敦都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龙头。

一般常见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其实是以一个具争议性的假设为基础：泽西岛、格恩西岛和马恩岛等英国皇家属地，以及开曼群岛、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直布罗陀等英国海外领土，是和英国本土区分开来的。若排除这个假设，就会得出更长串的国际金融中心名单，约占二〇〇八年六月时国际银行资产负债总额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前英国殖民地，那么，大英帝国，这个早已被视为不复存在的政治体，对现代金融体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占全球国际银行负债总额的 37%，以及资产总额的 35%。

更深入地检视国际金融中心名单，可以看出另外两个异常现象。其一是中型欧洲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重要性，例如瑞士、荷、比、卢四国和爱尔兰，每一个都是重量级金融中心，合计占全球国际银行负债总额近 20%。

第二个异常现象，涉及的是长久以来被视为在现代世界中无足

轻重的政治体：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卢森堡，不过，开曼群岛、泽西岛、格恩西岛、巴林、摩纳哥等，也都可以视之为现代版的城邦，当然，也别忘了伦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若不包含伦敦金融城，这类城邦合计约占二〇〇八年三月时全球国际银行负债总额的 17%；若把伦敦金融城包含在内，这个比重将达 28% 左右。

当然，这些数字某种程度上有重复计算，不过，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在形成英国主导的境外经济的过程中，大英帝国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注意欧洲中介租税天堂扮演的独特角色。这两者都有避税与逃税的功能，而这功能正是境外经济中英国主导的面向。不过，这些受英国影响的地区，也跟一九八〇年代起投资银行业务的兴盛有密切的关联，而投资银行业务则是欧洲租税天堂的专长，有人说这是“从无实体资产（例如商标、品牌等）中获取利益”——它们鼓励企业在它们境内注册这些无实体资产，以享用它们提供的低税工具。

租税天堂与专业人员

目前为止，我们把租税天堂当成一种国家策略来探讨，这个角度很常见，但可能造成严重的误导。若我们不深入了解那些支持租税天堂的商业事务所，将会遗漏租税天堂的一个重要层面。

在大多数租税天堂，都可以见到全球最大的会计事务所，还有律师、银行业者、税务专家和金融交易商，以及相关的信托与企业服务商，不过，他们最主要还是集中在其中三十多个大的地区。这些专业人员是关键角色，就我们所知，几乎每一种用以逃避税赋和法规的立法创新，都有他们的参与。他们建议及哄诱政治人物提供